

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霸权的逻辑： 地理政治与 战后美国大战略

吴征宇 著

中国人民大学 985 工程“国际政治经济与欧洲问题研究”课题资助项目

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霸权的逻辑： 地理政治与 战后美国大战略

吴征宇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吴征宇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ISBN 978-7-300-12124-6

I. ①霸…

II. ①吴…

III. ①政治地理学-研究②发展战略-研究-美国

IV. ①K901.4②D77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4608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

吴征宇 著

Baquan de Luoji: Dilizhengzhi yu Zhanhou Meiguo Dazhanlu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16 插页 1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54 0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第一部分 导 论

第 1 章 现实主义、地理政治与美国大战略	3
1.1 “大战略”的内涵及演变	6
1.2 现实主义理论与大战略研究	10
1.3 “结构理论”与美国大战略	13
1.4 地理政治变迁与“英国式战争方式”的终结	16
1.5 “新古典现实主义”与美国大战略	20
1.6 主要观点与内容结构	23

第二部分 地理政治：历史与理论

第 2 章 地理政治研究的变迁	31
2.1 地理政治学的含义、流派与发展	32
2.2 地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	43
2.3 地理政治学与国家大战略	54
第 3 章 地理政治、海权与陆权	65
3.1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66
3.2 麦金德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恐惧	77
3.3 “边缘地带” vs. “心脏地带”	88

第三部分 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

第 4 章 霸权、均势与地理政治	101
4.1 “霸权稳定论”及其批判	102
4.2 霸权、均势与国际秩序	112
4.3 霸权、地理政治与大战略	123
第 5 章 地理政治与全面遏制战略的形成	135
5.1 地理政治与“遏制战略”的起源	136
5.2 地理政治与早期的“遏制战略”	146
5.3 地理政治与“遏制战略”的蜕变	157
第 6 章 地理政治与冷战后的美国大战略	168
6.1 地理政治与“绝对优势战略”	169
6.2 地理政治与美国对西欧的大战略	179
6.3 地理政治与美国对东亚的大战略	190

第四部分 地理政治：现实与未来

第 7 章 地理政治与 21 世纪的美国大战略	205
7.1 “后哥伦布时代”的地理政治变迁	208
7.2 地理政治与未来的美国大战略模式	211
7.3 地理政治、领导者与大战略	221
参考文献	233
后记	251

第一部分



现实主义、地理政治与美国大战略

自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就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也因此从两极结构转变成为单极结构。与这种转变相对应的是，在过去十多年中，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有关冷战后美国大战略问题的讨论。^① 尽管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但参与这场讨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一致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美国应放弃以往的那种“绝对优势战略”（Preponderance），转而采取某种“离岸制衡战略”（Off-Shore Balancing），而后者意味着美国应摆脱冷战期间在欧亚大陆上承担的主要义务。^②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就在于：“水体阻碍力”使国际体系中任何大国都无法获得全球霸权，大国能够希望获得的最好结果是成为区域霸权国，而后者必然将阻止其他地区的大国获得同等霸权，即区域霸权国相对其他地区而言必然将充当“离岸制衡者”的角色。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则在于：追求国际政治中的霸权是一种自我毁灭性的战略，这不仅是因为任何形式的霸权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过度伸张，同时也因为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迟早将通过扩充实力或彼此结盟的手段来挫败这种对霸权

① 有关 20 世纪 90 年代后出现的关于美国大战略问题的综合性讨论，参见 Robert J.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Michael E. Brown, ed., *America's Strategic Choice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②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9.

的追求。^① 在理论上,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推崇的“离岸制衡战略”本质上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战略,即冷眼旁观,以便让相关的地区大国首先来承担起制衡区域霸权国的责任,只有当相关的地区大国无法凭借自身力量有效承担制衡责任时,另一个地区的“离岸制衡者”才会介入争端中。^② 有鉴于此,“离岸制衡战略”也就是要求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及早地退出欧亚大陆,以便让相关的地区大国承担起维护本地区稳定与和平的责任;只有当欧亚大陆上再次出现了霸权威胁且相关的地区大国无法有效制衡时,美国才需要重返大陆,而一旦达到制衡目的,美国应当再次退出。^③

然而,与这种预期正相反,“离岸制衡战略”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得到美国决策者的遵从,后冷战时代的历届美国政府反复表述的根本大战略目标就是使单极世界永久化:1992年,老布什政府起草的《防务计划指导报告》就写道,“我们一定要保持那些阻止潜在竞争者渴望获得某种更大的区域角色或全球角色的机制”,这种机制不仅旨在阻止可疑国家(中国或俄罗斯)的崛起,而且旨在防止美国的盟友(日本或西欧)成长为新强国;1997年,克林顿政府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写道,美国的大战略目标及其相应的军事姿态,就是要通过“制止一个潜在挑战者主动发起一场同美国的军事竞争”的方式“来保持美国的全球性领导地位”;2002年,小布什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仅保留了所谓“预防性战争”、“先发制人打击”的选择,而且宣布美国将不会容忍任何其他国家超越(甚至是赶上)美国的军事能力。^④ 与美国的霸权目标相对应,冷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对可能出现的多极世

① 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对美国大战略的主要观点,参见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42.

③ Robert J.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76.

④ “Excerpts From Pentagon’s Plan: ‘Prevent the Re-emergence of a New Rival’,” *New York Times*, 8 March 1992, A14;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7, p. 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2002, p. 30.

界都表现出明显的反感，因为多极世界的出现将意味着美国绝对优势地位的终结：1992年，老布什政府起草的《防务计划指导报告》就认为，“恢复早先的那种多个军事强国在安全结构发生任何事态情况下都相互制衡，而与此同时区域和平乃至全球和平都危在旦夕的时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1997年，克林顿政府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强调，美国必须要保持自己在维持区域稳定义务方面的可信性，否则将导致美国的盟国和朋友“要采取更具有分歧性的防务政策和防务姿态”，这种情况无疑将根本动摇美国世界领导地位赖以维持的同盟体系；2002年，小布什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再次确认了美国政府对多极结构持有的不信任态度，它宣称，美国对以往那种大国竞争模式的可能再现保持着密切关注，而针对多极结构造成的不稳定的“药方”就是要保持美国在当今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①

美国究竟应追求霸权还是应成为“离岸制衡者”？这是一个关系到美国未来大战略行为及其后果的关键问题：作为一个霸权国，美国有可能成为其他国家反霸制衡的对象，且美国将会在欧洲、东亚和波斯湾保持自己的前沿性军事存在；作为一个“离岸制衡者”，美国则不太可能会激发起针对自己的制衡同盟，且美国不久将会从欧洲、东亚和波斯湾撤出其军事力量。^②在理论上，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虽然存在众多分歧，但具体到美国大战略问题上，两者都认为美国不应寻求区域外霸权。然而，冷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的政策表明，冷战后美国的大战略行为已完全超出两者的预期，而这点同样也暴露出结构理论的固有弊病。无论冷战期间还是冷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大战略一直保持着惊人的延续性，对这种由结构主导的大战略研究中出现的异常现象，结构现实主义者的典型做法就是从国内变异中寻求解释，而这点正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一大贡献，后者在解释战后美国大战略上的代表性成就是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雷恩新近才提出的所谓“区域外霸权理论”

① “Excerpts From Pentagon’s Plan: ‘Prevent the Re-emergence of a New Rival’,” *New York Times*, 8 March 1992, A14;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7, p. 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2002, p. 30.

② Christopher Layne, “Rethink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5, No. 2, 1998, p. 22.

(Extra-regional Hegemony Theory)。① 严格地说，将单元层次的因素纳入结构理论的做法虽然能够增强理论的解释力，但这点不仅损害了结构理论的简约性，而且破坏了结构理论的内在逻辑。更重要的是，以单元层次的因素（霸权动机）来解释美国霸权行为的做法是一种循环论证，这种论证在理论上缺乏必要的说服力。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美国对欧亚大陆采取的一直是某种“绝对优势战略”，这种情况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得到丝毫改观，这也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没有预见且无法解释的现象。本书的目的是指出作为当代大战略研究基础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内在弊病，进而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种能够解释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大战略及其延续性的理论，并且在随后研究中以相关的历史个案来验证这个理论。



1.1 “大战略”的内涵及演变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大战略研究就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与此极不相称的是，作为研究基础的大战略概念迄今仍没有一个权威、统一的定义。因此，在讨论战后美国大战略问题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大战略”的内涵及演变。

大战略是一个超越了单纯军事战略的现代战略概念。历史上首次对大战略予以系统阐述的，是 20 世纪英国著名的军事史学家兼战略思想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② 他认为，“正如战术是军事战略在较低一级的运用一样，（军事）战略是大战略在较低一级的运用”；他指出，“大战略的任务就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确定的目标”③。在现代战略思想史上，哈特之所以

①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7.

② 哈特对大战略概念的论述最早出现在 1929 年出版的《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一书中，他后来对该书内容进行了扩充并且以《战略论》为名于 1967 年出版，本书采用的引语全部出自哈特《战略论》第二版。参见 B. H. Liddell Hart, *The Decisive Wars of Histo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29; B. H. Liddell Hart, *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 London: Faber, 1967.

③ B. H. Liddell Hart, *Strategy*, 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Praeger, 1974, pp. 321, 322.

提出大战略概念并将其自觉应用于评估两次大战期间的英国军备建设，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本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但这种胜利非但没有带来好处，反而加速了协约国战后的衰落。对这种矛盾的反思使哈特意识到，单纯的军事胜利并不是真正的胜利，而赢得战争也不等于赢得有利的和平，因此有必要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① 哈特认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结局的关键是由于交战双方都深受克劳塞维茨战争观的影响。他相信，克劳塞维茨将战略定义成“为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役的运用”至少有两个缺陷：它侵入了必须由政治领导而非军事领导负责的政治领域；它导致了将战斗作为实现战争目的唯一手段的错误观念。哈特指出，由于战争目的“是获得一种更好的和平”，因而“带着对你所期望的那种和平的不断关注来进行战争至关重要”；如果只关注获胜而不考虑后果，“你就可能打得过于精疲力竭，以致无法从和平中获益，这种和平几乎肯定是一个糟糕的和平，其中包含着又一场战争的祸种”^②。哈特由此引出了两个关键结论：首先，真正的胜利应该是“战后的和平状况和本国人民的处境优于战前”，即大战略既要关注如何打赢战争，更要关注实现怎样的和平；其次，大战略“不仅应当将各种不同的手段结合起来，且应当调节这些手段的使用，即要为保证自己的安全和繁荣而避免损害未来的和平状态”^③。

哈特对大战略的界定同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密切相关，由于这场战争使英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其战后境况并不优于战前，因而哈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欧陆义务战略”及所谓的“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观”深恶痛绝。哈特认为，要赢得真正胜利，不仅应当使目的与手段相适应，且同时必须采取“间接路线”，因为“进行战争采取的路线，如果不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不能够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那么就难以使战争取得有效结果”^④。哈特提出的“间接路线”实际上乃是他大战略思想的核心，这种“间接路线”包

① Brian Bond, *Liddell Hart: A Study of His Military Thought*,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68-70.

② B. H. Liddell Hart, *Strategy*, 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Praeger, 1974, pp. 333, 353.

③ Ibid., pp. 357, 322.

④ Ibid., p. 6.

括两项内容，一是军事战略层面的“战略轰炸”和“闪击战”，二是避免过度承担大陆义务的“英国式战争方式”。^①继哈特的大战略思想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战略研究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与这种转变相对应，大战略概念也同时得到更深入的发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战略学家爱德华·米德·厄尔（Edward M. Earle）提出的大战略定义。厄尔认为，“战略也就是控制和利用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之资源（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的艺术，以便达到有效地实现其至关重要的利益并保障这种利益不受到现实的、潜在的或只是假设的敌人侵犯之目的。最高形态的战略——有时被称之为大战略——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将国家的各项政策和各种军备如此地整合在一起，以致使诉诸战争要么成为不必要的举措，要么以最大程度的胜利这么做”^②。同哈特界定的大战略概念一样，厄尔的定义强调的仍然主要是赢得战争胜利的目的，并且据此将大战略同那些针对特定战役制定的纯粹的军事战略明确区分开。然而，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同哈特的概念相比，厄尔的定义更为明确地表明一种适当的大战略应该是极为复杂和多层面的东西，这点实际上大大扩展了大战略的研究范围，从而将战时和平时的国家政策全部包括在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战略概念逐渐从怎样赢得战争开始向其他方面扩展，对此贡献最大的当属著名战略史家保罗·肯尼迪（Paul M. Kennedy，现任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系迪尔沃思讲席教授）。肯尼迪对大战略概念的修正和补充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大战略不仅适用于战时，而且适用于平时，大战略的必要性及运用既不因战争爆发才开始，又不因战争结束而停止，只要一国有根本的政治目标，就应当有为之服务的大战略。其次，无论战时还是平时，大战略的根本要素都是目标与手段的平衡。在战时，领导者既要考虑怎样赢得战争，又要考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在平时，领导者既要注重相关的资源开发和实力建设，又要根据实际能力来制定政治目标。最后，除与军事手段相关的问题外，大战略还必须将许多其他因素考虑在内，例如，有节制地使用和

① John J. Mearsheimer, *Liddell Hart and the Weight of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89-93.

② Edward M. Earle, "Introduction" in Edward M. Earle,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viii.

调控国家资源、外交手段在平时和战时的重大作用、国民士气和政治文化问题等。^① 与肯尼迪的修正和补充相比，战后大多数学者界定的大战略概念更强调国家的（对外）安全目标，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他认为，大战略就是在各种复杂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学问，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计谋及其他可想象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不同程度及多种形式的控制，从而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②。柯林斯的定义目前已经被国际关系领域中从事大战略研究的大多数学者认可。例如，1985年，美国政治学家巴里·波森就强调，大战略“是关于一国如何最好地保障国家安全的理论，一国的大战略必须要确认国家的外部威胁，并为此采取相应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其他手段”；1995年，美国政治学家江忆恩也指出，美国学术界“一般将大战略定义为动员国家所有的实力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行为，这里的国家目标主要指反对外来干涉威胁的战略目标”^③。

本书中使用的“大战略”就是指国际关系中国家就如何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及其他相关手段来实现其（外部）安全目标而进行的筹划和指导。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本书中使用的大战略并不等同于国家安全战略，因为国家安全战略除国际层面的内涵外还包括国内层面的内涵，即国家安全应包括内外两部分，但严格意义上的大战略并不涉及国家的内部安全；其次，尽管有学者认为大战略主体不仅包括国家，也包括所有能够提出其明确目标的人类群体（如企业、恐怖集团等），但大

① Paul M. Kennedy, “Grand Strategy in War and Peace” in Paul M.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y in War and Pea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

② [美] 约翰·柯林斯：《大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43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78。

③ Barry R.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3;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7.

近十余年来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大战略概念的界定同约翰·柯林斯的定义大致相同。参见 Charles A. Kupchan,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 Eric A. Nordlinger, *Isolationism Reconfigur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9; Thomas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 Robert J.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 Colin Dueck, *Reluctant Crusad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

多数研究者仍将国家视为大战略主体，本书中使用的大战略也是指国家大战略。^①



1.2 现实主义理论与大战略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美苏冷战的推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英两国）的大战略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意义上的大战略研究一直都深受肯尼斯·沃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在促进当代大战略研究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使其带上了某些根本性缺陷。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当代大战略研究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当代大战略研究一般都是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为主要自变量。尽管其他因素（尤其是技术因素和地理因素）在具体研究中可以作为干扰变量而存在，但这些变量并不影响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对这类研究中出现的异常现象，研究者一般都是从国内变异中寻求解释，而这点也是新近出现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大战略研究的一大贡献。^②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当代大战略研究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研究者都是以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即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考察结构及结构与单元层次因素的互动对国家大战略的重要影响，这种研究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注重在既定结构条件下考察认知因素及国家动员社会资源能力的重要作用。^③ 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以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南的当代大战略研究的主要弊病，是忽视国际体系的运行环境（尤其是技术因素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对大战略的重大影响，而这点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内在弊端造成的。

① 本书作者对国家大战略概念的界定得益于中国学者目前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参见时殷弘：《国家大战略理论与中国的大战略实践》，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3）；周丕启：《国家大战略：概念与原则》，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7）。

② Brian Rathbun,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2, 2008, p. 296.

③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 155.

沃尔兹原本力图创立一种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其根本目的是为人们理解国际政治现实提供一种系统的分析框架。对沃尔兹来说，由于任何体系都包含一种结构和相互作用的单元，因而任何体系都包括两个层次，即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前者指“体系构成单元的排列及这种排列依据的原则”，后者指“体系构成单元的属性及单元间的互动”。沃尔兹据此将国际政治理论划分为两种类型：简化理论和系统理论，前者指那些将原因设想为完全是集中于单元层次上的国际政治理论，后者指那些将原因设想为同时也处于体系层次上的国际政治理论。^① 对沃尔兹而言，由于简化理论只是一种通过了解整体各部分的性质及互动来理解整体的理论，因而这种理论的根本前提是假设在国家的行为目标和行为结果间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因果关系。但国家的行为动机很少同行为结果相一致的事实表明，国际政治现实不仅受单元属性及互动的影 响，而且受体系层次变量的影响，因此简化理论无法对国际政治现实做出充分的解释，只有系统理论才能使我们认清塑造国际政治现实的诸种力量。^② 沃尔兹认为，要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首先必须将两个层次的变量区分开，然后再考察这两种变量间是怎样相互作用的。但沃尔兹将精力全部集中在定义国际政治结构和考察这种结构产生的效应上，就构建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而言，他仅完成了第一步工作，即他真正构建的乃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该理论解释的只是“体系性结果”而不是“国家的行为”。沃尔兹理论的这一特征集中体现在其理论的核心要素“均势自动生成论”中。

沃尔兹从他的理论构架中推导出的核心命题就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均势必然会反复地和自动地生成。他认为，这个命题的成立只需要有两个基本条件，即“秩序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且在这种秩序中生活着一群希望生存的单元”^③。此命题的逻辑依据乃是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产生的两种限制作用：首先，由于主权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缺乏公共权威的自助状态，因而国家为生存必然会模仿那些比自己更成功的国家，以保持实力平衡；其次，由于任何模仿都会受单元自身条

①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p. 40, 80.

② Barry Buzan & Charles Jones &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53.

③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 121.

件的诸多限制，因而除模仿外，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还会以对外结盟的方式来平衡自己与那些在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之间的力量。沃尔兹阐述的这两种限制作用，实际上也就是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为生存而必然采取的两种手段——“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这两种手段最终都指向同一种结果，即均势反复和自动地生成。^① 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限制作用真正揭示的是一种制约所有国家的力量，虽然对这种力量的认识有助于人们理解无政府状态中各国在面临他国权力增长或霸权企图时可能做出的反应，但沃尔兹认为仅仅如此并不能够使人们准确预测各国最终的反应，因为各国最终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仅取决于结构产生的约束力，也取决于单元自身的特点。换句话说，沃尔兹的理论只表明为什么相似情形中国家的行为必然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但如果要解释各国具体反应上的差别，就必须展示各国国内结构“是如何影响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动的”^②——沃尔兹做出的这个规定实际上也就是意味着，他的理论解释的对象只是“体系性结果”（即均势最终会生成），而不是“国家的行为”（即国家总是会制衡体系中的霸权国家）。

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进程中的代表性成就，沃尔兹创立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不受到时空限制且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这种理论赖以构建的思想基础之一是源自亚当·斯密并经过保罗·萨缪尔森等人改造过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沃尔兹理论中有关国际无政府状态之根本效应的界定和阐述，正是建立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与“市场”的类比基础上。^③ 然而，沃尔兹提出的这项类比根本无法成立，因为市场逻辑得以形成的诸要素（例如企业、资本、劳力、商品等）全都是流动性的，而作为国际政治体系基本构成单元的国家则根本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流动性，即国家的空间位置完全是固定不变的，这意味着沃尔兹创立的结构理论本质上不仅是“非历史的”，而且是“非空间的”。^④ 作为当代大战略研究的主要思想基础，沃尔兹创立的结构理论其首要特征从根本上说

① Stefano Guzzini,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130.

②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 125.

③ Stefano Guzzini,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129.

④ Hans Mouritzen, *Theory and Realit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dershot: Ashgate, 1998, p. 27.